

〔苏〕 И. 维霍采夫

五十 — 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

北京大学俄语系

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部 发 行
五十 — 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5.25印张 110千字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册

书号: 10209·6 定价: 0.50 元

目 录

五十 — 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

П·维霍采夫 著

魏荒弩、林明虎、冯 加 译
杜奉真、张有福、李毓榛

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特点	1
散文	12
诗歌	73
戏剧	111
本书论及的主要作家作品索引	124

附录：苏联文学史研究近况掠影

——评新编《苏联文学史》、《俄罗斯苏维埃文
学史》

李明滨 143

编后记

162

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的特点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在苏联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工业生产水平较战前时期增长了若干倍。党正顺利实现旨在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苏联科学技术的胜利，特别是在对宇宙进行的历史性研究中所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无可争议的。科技革命也影响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苏共二十大至二十四大，都是人民生活的重要阶段。历次代表大会对国家发展的上述阶段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并采取了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在苏共党纲和苏共二十三大、二十四大的决议中，确定了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并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教育苏维埃人的任务。

这一时期，国内的文学生活相当活跃。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作家协会。一些新的文学艺术杂志（《莫斯科》、《涅瓦》、《我们的同时代人》、《外国文学》）、历史文学杂志（《文学问题》、《俄罗斯文学》）以及国内许多州的文学艺术杂志（《顿河》、《伏尔加》、《北方》、《高潮》等等）开始发行。最杰出的作家（М·萧洛霍夫、Л·列昂诺夫、А·普罗科菲耶夫、Н·吉洪诺夫、Н·包戈廷、А·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获得了列宁奖金。

苏联作家第二次（1954）、第三次（1959）、第四次（1965）和第五次（1971）代表大会是国内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历次代表大会对苏联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例如，М·萧洛霍夫、

B·奥维奇金、M·伊萨柯夫斯基、M·卡里姆、A·雅申等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曾大声疾呼地谈到必须为文学的党性、人民性和高度艺术技巧而奋斗的问题。作家们对一些具体作品的缺点和文学上的粉饰倾向进行了严正的批评。许多发言的中心思想，都是文学必须紧密地与生活 and 全民任务联系起来。

苏联日益增长的强大力量，我国人民顺利克服战后发展中的困难，其中包括克服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原则的加强，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国外进步舆论的广泛兴趣。世界各族人民认为我国的成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取得胜利的坚实基础。各民族间日益扩大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各国艺术工作者对苏联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有助于我们的思想和道德在国外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苏联人民的巨大成就引起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疯狂仇恨。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以武力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感到失望以后，便大力对我国人民进行思想上的瓦解工作。资产阶级宣传机关积极利用现代报导的一切工具（无线电、电视、电影、报刊）来反对苏联。在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成立了几百个各种研究机构，其中有成千上万的“苏联学家”在工作。这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集团为了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不惜耗费巨额的资金。

苏联文学自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特别注意。他们利用它在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缺点，经常组织轰动一时的抨击和歪曲苏联作家作品的运动。他们曾多次企图通过论文、“研究”、教科书等方式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在“学术”

上威信扫地。

资产阶级理论家加剧形式主义和反社会的艺术观念的宣传，也是同样危险的。攻击现实主义、宣扬极端主观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混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界限、断定艺术上道德原则和美学原则的独立性、企图将卡弗卡、普鲁斯特、伊奥涅斯科这样一些作家推到二十世纪文学的首要地位，——所有这一切，其目的就是要动摇人们对于艺术是一支对世界进行社会改造的有效力量的信念。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环绕着象 X·奥尔捷基-伊-加谢特的《艺术的非人道主义化》之类的作品大叫大嚷，甚嚣尘上。

在美学问题上，越来越经常地听到一些修正主义者的主张（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法国的勒菲弗尔、意大利的 B·斯特拉达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打倒派”）。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列宁的文学艺术党性原则。

修正主义批评家们打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伪造苏联文学史，企图证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没有创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文学发展的实践断然驳斥了这种臆测，因为 M·高尔基、M·萧洛霍夫、И·列昂诺夫、普里什文、A·马卡连科、A·法捷耶夫、H·奥斯特洛夫斯基、A·特瓦尔多夫斯基等的许多经典作品，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在苏联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如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单是为了面包》和 И·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表现出批判主义的倾向，片面而偏颇地描写了我们的生活。这些作品受到了公正的批评。

苏联作家的某些作品（И·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Б·奥库贾娃的《中学生，祝你健康》、Б·涅克拉索夫的《第二夜》)和一些评论文章表现出一种趋势，它们抽象地解释作家的人道主义和世界观，彻底地重新估价苏联文学的经验，并突出那些与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很少联系的作家和作品。

经过五十年代后半期尖锐而紧张的讨论，证明修正主义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是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背道而驰、势不两立的，他们企图修正苏联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因而遭到批驳。

苏联的文艺学家(М·赫拉普钦科、А·梅特钦科、Б·谢尔宾娜、А·奥弗恰连科、Б·留里科夫、Б·科瓦廖夫、Л·扎顿斯基、Я·艾里斯别尔格)以及匈牙利(贝拉·基奥佩齐、拉斯洛·马特拉伊)、捷克斯洛伐克(Л·什托尔、И·哈耶克)、波兰(叶日·普特拉曼特、弗拉季斯拉夫·马赫耶克、威廉·谢夫契克)、保加利亚(С·鲁萨基耶夫、Х·杜杰夫斯基)的一些文艺学家和批评家在其著作中对艺术的反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例如，А·梅特钦科在一些文章和《传统的继承和斗争的收获》

(1971)一书中不仅令人信服地揭露出Б·谢奇卡列夫、П·勃罗兹、Б·斯特拉达、Р·雅科勃松、Э·菲舍尔、Р·加罗第、Е·穆奇尼克等这样一些力图向西方读者曲解苏联文学的资产阶级文艺学家的粗暴政治偏见，而且还揭露出他们的理论是缺乏根据的。具有充分事实根据、并掌握了科学方法论的苏联学者证明，现代资产阶级艺术的先锋性是捏造出来的。研究者彻底揭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打倒派”所用的手段是毫无依据的。

在 M·B·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1972)一书中,根据一些具体的历史和文学事实,揭示了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优秀成果的深刻联系。作者指出,作家的艺术成就是与他所掌握的先进时代思想、与他的历史和社会哲学思维分不开的。M·赫拉普钦科根据苏联和世界文化的发展经验,指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以及奠定苏联艺术基础的思想的新颖和独创性。

A·奥弗恰连科是许多现代文化国际讨论会和辩论会的积极参加者,是对那些“苏联学家”所用方法手段研究有素的人,他在自己的多次发言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进程》(1968)一书中,一直在热情而坚定地揭发那些经常在国外出现的关于苏联文学的奇谈怪论。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敌人所炮制的“谎言制造法”本身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重大优点之一,就是作者们都积极地参与了现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美学方面的斗争,并在世界文学和美学观念的广阔背景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在新阶段文学界和评论界斗争的特点之一。

在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复杂的新条件下,共产党遵循列宁的原则,巧妙地、有分寸地帮助作家履行他们对人民的崇高职责。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报刊(《真理报》、《共产党人》)都非常关心文学问题。

党中央委员会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艺术语言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并号召作家真实而明确地描写我

们光荣的同时代人，亦即那些正在实现全世界历史性事业、同时也在巩固苏联国家力量和威力的人们；号召作家研究整个生活的深度和复杂性，了解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途，揭露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央委员会指出，苏联作家协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作家进行思想教育，同形形色色异己思想的具体表现经常进行斗争，不屈不挠、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提高艺术技巧。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纲领，必须清楚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阶段的内在实质，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守不渝。在目前情况下，作家对于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任务的认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决条件。

中央委员会对缺乏创作能力的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等违背苏联艺术原则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当落后于生活的时候》，具有重大的意义。文章是针对《新世界》和《十月》这两家杂志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而写的。文章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仅限于两种刊物的范围，而涉及到其它许多重大问题。党反对两个极端：一方面，既反对低估苏联人民过去的伟大成就的怀疑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反对忽视当前的一些重大变化。文章又一次使人想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而历史地描写现实。文章再一次号召作家提高他们创作思想和艺术水平。

苏共中央四月（1968）全会，对于确定苏联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有着原则性的意义。在全会上讨论了思想工作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苏共中央强调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斗争是十分尖锐和紧张的。在此情况下，

苏联作家的政治责任要比以前更大了，苏联作家应该把自己的活动作为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看待。

在苏共二十四大（1971）的决议中指出：

“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是党的文学艺术政策的出发点。党主张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础上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党高度评价艺术家的天才、创作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以及同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现象的毫不调和的精神。我们的文艺批评必须积极执行党的路线，表现出高度原则性，把严格要求同对艺术珍品创作者采取有分寸的和爱护的态度结合起来。”^①

党中央在实现苏共二十四大决定的同时，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通过《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拟定了涉及文学、评论和文艺学的范围广泛的庞大任务，详尽而深刻地分析了关于文学和文学评论这一科学范围内的重大缺点。那些旨在克服这些缺点和加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原则的具体建议，对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原则性意义。

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文学批评问题，使其与一系列相近领域如文艺学、书报评介、新闻工作、无线电广播与电视、电影和出版事业等联系起来，并指出，由于“艺术文化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日益增长的作用”，^②决定了这些文化领域主要目的的共同性。

苏共中央把文学艺术、文学批评和文艺学看作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手段和思想斗争

① 《苏共二十四大文件》，莫斯科，1971年版第207页。

② 《文学报》，1972年1月26日。

的武器，于是提出一系列重要措施，把各创作协会、科学机关、师范院校和各大学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提高文学的方法论水平和理论基础。特别受到重视的是：必须同文化艺术中资产阶级观念的反动本质进行思想斗争，从党性和人民性的立场来提高评论和文艺学的专业水平。《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总结了历来的经验、同时鼓励了新的创作探索，肯定文学和批评在社会运动中的巨大作用。

在思想斗争中不可能有和平共处，中立也是不可思议的。列宁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一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①苏共中央四月（1973）全会又一次着重指出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最坚决的、进攻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必要性。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作家对认识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最复杂的一些问题发生兴趣。作家们力图深刻而广泛地认识当代的现实，尖锐而大胆地提出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很多作品（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M·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И·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K·费定的《篝火》、O·别尔戈丽茨的《白天的星星》、B·索洛乌欣的《弗拉基米尔公路》）的特点是，对我们这一时期、我们这一时代，对我们经历中感受到的一切，都作过深沉的思考。

萧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可能是对那些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06页。

诬蔑苏联文学把生活理想化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好回答。作家描述了一个普通俄罗斯人安德列·索科洛夫的生平、他的被俘、整个一家人的死亡、他的巨大的勇气和战争给予他的难以置信的苦难。对于这一切，小说作了冷酷无情的叙述。安德列·索科洛夫的遭遇体现了人民的功勋和人类的巨大悲剧。集体化时代的优秀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显示着深刻的真实性。H·尼林描写十月革命后现实生活的杰出的中篇小说《试用期》和《冷酷》，充满了严峻的紧张情节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激情。

当前很多作品证明，这几年来在我国文学中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质变。这些作品以党的立场阐明了苏联社会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其中包括为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列宁原则而进行的斗争，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理想。

出现了许多深刻地、浓墨重彩地表现苏联农民生活的作品——特写、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些作家描写农村时往往加以粉饰，因此在我们的报刊上受到了公正的指责。由于对生活的认识十分肤浅，因而把现实的实际困难和矛盾表现得轻描淡写。因此，B·田德里亚科夫、B·舒克申、E·多罗什、П·普罗斯库林、B·索洛乌欣、B·阿斯塔菲耶夫、E·诺索夫、Ф·阿勃拉莫夫、B·别洛夫、C·克鲁季林、Г·特罗耶波爾斯基、B·福緬科等人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特写的问世，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些作品虽然在体裁和技巧水平上都各自不同，但其内容却有相似之处。作者们真挚而忠实地叙述了集体农庄生活的复杂问题、在争取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苏联农村的精神生活。这些作品并没有把生活理想化，但

是却充满着深刻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力量及其进一步繁荣的不竭源泉的坚强信心。

在B·科热夫尼科夫、B·奇维利欣、C·沃罗宁、B·田德里亚科夫、Ю·特里丰诺夫、B·李帕托夫、B·波列沃依等作家的作品里，工人、知识分子、学者的生活得到真实的描写，生产上和精神上的激烈冲突也得到了解决。

一些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显然要力求使分析的原则深刻化。这样的作品有：Ю·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和《热的雪》、Г·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和《一九四一年七月》、K·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C·斯米尔诺夫的《布列斯特要塞》、B·科热夫尼科夫的《盾与剑》、П·尼林的《穿过墓地》、A·阿纳尼耶夫的《坦克成菱形前进》、A·卡利宁的《战争的回声》、Г·科诺瓦洛夫的《源泉》、И·斯塔德纽克的《战争》。它们的特征，是力图要比从前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把我们获得伟大胜利和遭致失败的种种原因搞清楚。这些作品，再现了严酷惨烈的战争事件、人民无比的英雄气概、军官们日益提高的战争技能和党的组织工作的活动。

不仅散文，而且诗歌和戏剧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无冲突论的风气使戏剧创作蒙受极大的损失。象B·敏科《姑隐其名》、A·马卡约诺夫的《肝结石》、C·米哈尔科夫的《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等等讽刺喜剧的出现，便是对这种风气的一个直接反动。作品中并非一切都是成功的，但探索是有益于发展的。无论在心理剧、英雄剧或喜剧中，戏剧创作越发展，它反映现实也就越广泛、越绚丽多采。在A·柯涅楚克的《翅膀》、A·史泰因的《大洋》、A·阿尔布佐

夫的《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以及B·罗佐夫的剧作（《祝你成功》）和B·拉夫连季耶夫的剧作（《近旁某处》）中进行着严肃而坦率的谈话，——关于人生，关于尖锐的道德问题，关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种种矛盾以及关于宏伟的、美丽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我们的诗歌，——A·特瓦尔多夫斯基和A·普罗科菲耶夫、И·马尔蒂诺夫和B·卢戈夫斯科伊、B·鲁奇约夫和Bac·费奥多罗夫、Я·斯麦里亚科夫和И·伊萨耶夫的长诗和短诗中具有同样内容。政论性强、同时又充满深刻的哲理、加强个性化以及力图掌握历史运动的规律，成为诗歌的典型特征。诗歌在对同时代人进行公民和爱国主义感情教育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加强了分析的基础，与生活 的关系更密切了。苏联作家在继承苏联文学以前各时期的、而且早已成为世界文学财富的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能说出关于这个时代的极其真实的新见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苏联文艺学和评论工作的一个蓬蓬勃勃、富有成效的发展时期。有不少学术著作和研究专集是专谈作家创作以及苏联文学史上各个阶段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迫切问题的。

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对个别文学体裁发展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俄罗斯苏维埃长篇小说史》，1965；《俄罗斯苏维埃短篇小说史纲要》，1970）。在这几年中出版了一些最广泛地概括苏联文学史上各种不同现象的著作，其中包括科学院的四卷本《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史》（1967—1971）。关于苏联各族人民文学的比较详尽的研究工作开始了，《苏维埃多民族文学史》最初几卷已经问世。

当前，苏联的文艺学在全世界语文科学中占首要地位。

文学批评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了。它积极地干预着文学的发展过程，并越来越多地把一些著名学者吸引来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评论界对当代文学提出了一些复杂问题，促使它去进行探索。譬如，对语言与形象（《文学问题》，1961—1962）、关于长诗的体裁（《文学报》，1965）、关于抒情散文（《文学报》，1969—1970）、关于抒情诗的公民性（《文学报》，1970—1971）、关于艺术的民族性和国际性（《文学问题》、《文学报》、《民族友谊》）等这些重大的问题都进行过极其广泛的讨论。科学院举行过一些全苏的理论问题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迫切问题（1960）、关于俄国现实主义类型学（1967）、关于苏联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1972）。

学术著作、讨论和会议，是我们研究苏联文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胜利的见证，也是我们的评论和文艺学顺利发展的保证。学者和批评家们是密切联系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的。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在反对资产阶级文艺学、特别是反对外国的“苏联学家”对苏联文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歪曲方面带有积极的、进攻的性质。在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中最令人信服的论据之一，便是苏联文学最丰富的艺术遗产及其高度的思想美学成就。

散 文

由党的第二十次至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及其后的历届苏

共中央全会所决定的国内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变化，影响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不仅文学的选题和社会道德问题大大地扩大了，而且艺术地研究生活的原则更加丰富起来，散文作品的体裁也多样化了。这个过程与新生一代天才散文家（B·田德里亚科夫、B·索洛乌欣、Ю·邦达列夫、C·沃罗宁、B·阿斯塔菲耶夫、E·诺索夫等）的进入文学界和日臻成熟，是完全一致的。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主人公的命运进行过仔细研究、并尖锐地提出了时代的复杂问题的大量“精练体裁”（特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作品的出现，便是以短小体裁代替长篇巨著、以抒情激情代替叙事激情这种见解得以流行的原因之一。人们在谈论史诗般长篇小说的“危机”和文学发展这一崭新的、极不平常的阶段时，经常将其与以前各阶段进行对照。

作家们对图解概念、真假参半和平铺直叙深有反感，对新的生活主题和新的艺术形式勇于探索，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现代文学所取得的进展虽然很大，但它仍然在继续发展、深化那些为我国文学界所熟知的现代生活和过去历史的基本主题：工人和农民的集体劳动生活、知识分子创造性的追求、我国社会——不同辈分 and 不同社会环境的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精神生活。主题的范围依然主要是：个人与集体、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完全合乎要求的人的形成、性格的培养等等。

此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学与以前各时期文学的根本区别，还在于解决问题的性质本身。

在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根本任务——集中人民的力量争取经济上的进步、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并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决定了作家创作活动的主要方向以及他们作品的主题范围和提出的问题。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对复杂的矛盾冲突进行深刻的艺术分析；不管主题和生活素材如何，作家力求广泛地认识苏联现实的发展规律。人们开始对道德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同时，无论在历史题材上还是在战争题材上，或者在处理当代问题上对于英雄业绩和正面事物理解得更深刻了。作家在描写历史上某一阶段和人类活动的某一范围时，开始比从前更深入地把它与我国的整个社会历史进行对比。但同时也出现了片面地对苏联现实的阴暗面感到兴趣的倾向（Ю·邦达列夫的《寂静》，1962；В·凯特玲斯卡娅的《这样生活才有意义》，1960；А·阿尔丹—谢苗诺夫的《峭壁上的浮雕》，1964，等等）。

当时文学面临的任务，是更加详尽而深入地揭示我国社会前进的特点，并在不忽视人民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时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从新的立场指明新生事物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

我国文学一向所固有的东西，——为形成新人所作的艰苦斗争和社会生活的新原则，——现在有了更复杂的形式，但并未排除主要的东西。作家们力图深刻地洞察诸如党性、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公民性这样一些概念的辩证实质。能够作